

看不透的 日本

中國文化精英

眼中的日本

李兆忠 編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錄



繁體版序言	7
前言：中國人緣何看不透日本？	9
日本的發現	14
附：《日本國志》（節選）（一八八七）黃遵憲	18
可畏的日本	24
附：《絕命書》（一九一五）陳天華	30
「大中華」與「小日本」	36
附：《留東外史》（節選）（一九一六）平江不肖生	42
「留日反日」的真相	52
附：《銀躑躅》（一九三三）張資平	57
沉重的失態	66
附：《東京》（一九三三）成仿吾	71

曇花一現的東方「康橋」

附：《沙揚娜拉十八首》（節選）（一九二四） 徐志摩

87

《富士》（一九二四） 徐志摩

90

「人情美」的陷阱

附：《日本與中國》（一九二五） 周作人

100

《日本管窺之四》（節選）（一九三七） 周作人

104

忘恩負義的日本人

附：《行路難》（節選）（一九二五） 郭沫若

114

認識中國的一面鏡子

附：《藤野先生》（一九二六） 魯迅

134

中國首席「知日家」

附：《日本論》（節選）（一九二八） 戴季陶

150

第三隻眼看日本

附：《異國》（節選）（一九三二） 凌叔華

162

《千代子》（節選）（一九三二） 凌叔華

171



令人深思的誤讀

附：《神——一個人寫給朋友的信》（節選）（一九三四）巴金

184 178

天堂與地獄

附：《日本的文化生活》（一九三六）郁達夫

194

《雪夜》（一九三六）郁達夫

205

東亞之緣

附：《記東京某音樂研究會中所見》（一九三六）豐子愷

219 212

曖昧的日本

附：《去看日本的紅葉》（節選）（一九三六）方令孺

228

《遊日雜記》（一九三七）方令孺

235

黑夜中的橋樑

附：《為了中日友好》（一九五一）陶晶孫

244 250

繁體版序言

前不久接到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總編輯陳翠玲先生的電話，表示希望在海外出版《看不透的日本——中國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讓我重新拿起了此書。

重新翻閱這本書，感慨良多。這本書的完成對自己而言，確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如同一個起步落後的學生補完一門重要的功課。本書解讀晚清至民初十六位中國知識精英的留日體驗及對日本的敘述，在此基礎上，概括近代以降中國人的日本觀，分析其利弊得失，這對於拓展自己的視野，深化對日本的認識，有極大的裨益。

與此同時，面對那些評點文字，筆者不能不感到惶惑。作為一個半路出家的日本研究者，本人對前輩留日文化精英及「日本通」作了如此居高臨下的審視，語氣是如此的自信、肯定，甚至苛刻。現在我明白，這其實暴露了作者學養的有限，內功不足。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一切並非心血來潮的產物，也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長期醞釀、思考的結果，因此自有它的參考價值。時過境遷，我似乎不再能寫這樣犀利的文字。是得是失？我也不清楚。

近代以來的一百多年，中國出現過兩次關注研究日本的高潮，第一次在清末民初，以中日兩國國際地位發生逆轉、日本軍國主義猖狂侵略中國為背景；第二次在二十世紀末，以中國改革開放、中日兩國的實力此消彼長、摩擦爭端不斷升級為背景，中間隔著一個由冷戰造成的較大的斷層。由於歷史條件與知識背景的不同，兩代學人觀察解讀日本呈現出微妙的差異。前者憑藉深厚的學養和知識結構的優勢，對日本的研究不乏獨到深邃的見解，然而受制於救亡圖強的神聖

使命，表現出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處處將日本當作認識中國的鏡子，有時反而遮蔽了日本的廬山真面貌。後者缺乏深厚的學養和學貫中西的知識結構，但憑藉「事後諸葛亮」的優勢、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和「全球化」時代發達的資訊，對日本的認識更加客觀理性。竊以為，新老兩代「知日派」的真知灼見如能得到整合，形成優勢互補，「看不透」的日本或許終有一天會被看透。這正是本人的期待，也是編著這本書的潛在目標。

時值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週年，中日關係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拐點。古人云：四十而不惑。這個時候再次出版《看不透的日本——中國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另有一番意味。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中國人緣何看不透日本？

中國與日本素稱「同文同種」、「一衣帶水」，打交道的歷史有兩千多年，近代以降，又吃盡日本的苦頭，按理講，中國人應當最懂日本。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時至今日，中國的知識界一談起日本，引經據典的，依然是潘乃德的《菊與刀》，彷彿偌大一個中國就沒有人懂日本。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檢討起來，有兩樣東西深刻地制約了中國對日本的認識，一曰「大中華」，二曰「大西方」。

「大中華」比較容易理解，這是作為泱泱大國子民的中國人面對外部世界的一種特有的心態。中國自古地處東亞中心，文明起源最早，地大物博，道統悠久，不斷地給周邊少數民族以文化上的滋養，自然形成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具體到日本，就是將日本視作中國的屬國（至少是文化上的），認為日本的一切中國古代皆已有之。事實上，在近代之前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對日本的了解非常粗淺籠統。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日本到底是甚麼模樣，始終是一筆糊塗賬，直到一八四二年魏源編著《海國圖志》，一八四八年徐繼畲編寫《瀛環志略》時，情形依然如此。這種局面，直到西力東漸，日本「明治維新」初見成效時才有所改變。甲午一戰，羣爾島國的海軍重創大清北洋水師，中國割地賠款，簽訂喪

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人這才開始睜眼看日本，對日本的態度，由歷來大而化之的輕視，一變為急功近利的關注。此時的中國，雖然對日本刮目相看，骨子裡的文化優越感依然如故，在許多人眼裡，日本充其量不過是中國投石問路的工具，變法圖強的現成樣板。正如張之洞在《勸學篇》中主張的那樣：「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因為「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完全是為我所用的態度。

比起「大中華」，「大西方」比較複雜。作為「中央之國」，中國對西方的「蠻夷」原本也不放在眼裡，鴉片戰爭中領教了洋槍洋炮的厲害之後，中國人才感到震驚，開始尋找「制夷」之道，辦法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於是興辦洋務，引進西方的堅船利炮。甲午一役中國慘敗，宣告洋務運動的破產，有識之士意識到西方的人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先進，非學不可，於是進行維新變法，力圖建立一個像日本那樣的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國家。維新變法失敗，革命派登上歷史舞台，推翻了腐朽的清朝政權。然而，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變本加厲地混亂黑暗，專制依舊，引發一場前所未有的新文化革命運動，向西方學習「德先生」和「賽先生」，「全盤西化」論影響日漸擴大，並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一股重要的思潮。「大西方」的思維模式由此形成。

「大西方」的登場，並不意味「大中華」的銷聲匿跡，事實毋寧說剛好相反，西方列強作為中國的「現代化」的教師與強盜的雙重性，決定了中國對它們的態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來講，在追求文明進步、抨擊既定的社會制度與傳統文化時，中國人是有「大西方」思想傾向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強的壓迫欺凌時，中國人則情不自禁地「大中華」起來。近代以降中國看外國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中華」與「大西方」此消彼長、互為表裡的歷史。

具體到日本，情況更複雜，對日本這個曾經喝自己的奶水長大、而後負恩殺師的東洋「二鬼子」，中國人自然不會有好的情感。如果說中國人面對西方時，是「大中華」、「大西方」二元對立、互相轉換的話，那麼對待日本時，就是「大中華」與「大西方」合流，固有的文化優越感與一種歷史的勢利——崇洋媚西，有機地膠著在一起。這導致中國學子在日留學時深感「讀西洋書，受東洋罪」之苦，其情形，就像錢鍾書在小說《貓》裡調侃的那樣：「一向中國人對日本文明的態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為西洋太遠，只能把日本偷工減料的文明來將就。」

公平地看，近代以降，日本對中國文化上的影響不可謂不大。正如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指出的那樣：「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築成的。創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學生，語絲派的也是一樣。此外，有些從歐美回來的彗星和國內奮起新人，他們的努力和他們的建樹，總還沒有前兩派的勢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派的影響。因為這樣的緣故，中國的新文藝深受了日本的洗禮，而日本文壇的毒害也就盡量地流到中國來了。」其實豈止是文藝，整個中國現代文化何嘗不是同樣的結果，清末民初中國文化思想的現代轉型，離開了數萬留日學生的努力根本無從談起。據語言學家考證，現代漢語中的社會科學詞彙，大約百分之七十來自日本，我們現在經常掛在嘴邊的「先進」、「文化」、「代表」之類的名詞，無不來自日本。然而對於這樣的歷史常識，一般的中國人並不清楚，他們只知道古代日本從中國學去了漢字。於是，在「大中華」與「大西方」的雙重作用下，中國人一邊向日本學習，同時迅速地將日本遺忘。

其實，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大中華」與「大西方」並非一無是處。日本是一個缺乏固有文明，對外來文明具有極強的依賴性與吸納能力的島國，離開了古代的中國與近代的歐洲，日本文明根本無從談起。因此，倘若具備純正的理性，這種思維方式對於日本仍有一定的解釋空間。不幸的是，近代以降險峻的中日關係，日本負恩殺師的惡行，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情感，使很多中國人無法以理性的態度對待日本。「大中華」、「大西方」思維方式中合理性的一面因而消滅殆盡，其負面卻被推向極致，產生「日本是個賣淫國」、「日本文化一無是處」之類的聳論。

然而，無論是「大中華」日本觀，還是「大西方」日本觀，都有一個共同的盲點，就是不把日本當作一個獨立的客體對待。如果說前者因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而對日本的特殊性視而不見的話，後者就是將日本當作解決中國問題的手段與方法。於是，日本人的愛國、做事認真、愛美、進取心之類，統統作為中國國民性的負面對比而被誇張、絕對化，而對其所以然，卻給不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一個完整的日本，無形中就被割裂、被肢解，其本身的來龍去脈與廬山真面目，當然無從窺測和把握。

正是在這樣浮躁焦慮的背景下，中國個別「知日家」冷靜深入的眼光不能不顯得格外的可貴。遺憾的是，他們對日本的真知灼見，卻被淹沒在歷史的塵煙中，甚至他們自己，都無法避免歷史險風惡浪的打擊，不能不使人感到一種歷史的沉重感。

這本書的緣起，可以追溯到十年前，當時我正在寫《曖昧的日本人》，苦於缺少中國人撰寫的有關日本的參考書籍，經常一邊寫一邊想：清末以降，赴日留學的中國學子成千上萬，其中不少人後來成了歷史風雲人物、文化巨子，他們是怎樣看日本的？又有甚麼樣的高見？這種好奇，本身就說明問題，作為一名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我對前輩文化精英的日本解讀的成果竟是如此無知，說明文化的斷裂、歷史記憶的喪失，在這個時代有多麼嚴重！意識到這一點，工作也就有了動力，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編著成這本書。書名取《看不透的日本》，決非出於商業噱頭，而是有感於中國人不容易認識日本，有感於日本文化的微妙難解，有必要下大功夫研究。書中所選的十六位中國現代文化精英，都是東瀛生活的親歷者，惟其是親歷者，他們對日本生活的解讀才格外地耐人尋味，不管這種解讀是正是偏，是對是錯，是真是幻，字裡行間都跳蕩著一顆顆鮮活的中國心，給後人提供了前輩中國人看日本的真實圖景。這是一筆無法回避的精神遺產。

此書的編選出版，得到田園先生的熱情鼓勵與幫助，田園先生高度敬業的精神令人感佩，在此深表謝忱！

二 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於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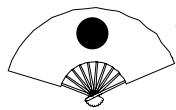


黃遵憲

(一八四八—一九一五)

「日本自通商以來雖頗受外侮，而家園如故，金甌無缺，猶得以日本帝國之名，捧載書而從萬國後。壤地雖曰褊小，其經營籌畫，卒能自立，亦有足多矣。然而日本論者方且以英之三島為比，其亟亟力圖自強，雖曰自守，亦頗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試展五部洲輿圖而觀之，吾誠恐其鼎舉而躡絕，地小而不足迴旋也。」

——在日本羽毛未豐的當時，黃遵憲就看出其「以小生巨、遂霸天下」的野心和「鼎舉而躡絕」的後果，可謂目光如炬，無怪乎甲午戰爭之後有人驚呼：《日本國志》如果早發表的話，可以省去我們對日賠款二萬萬兩銀子呢！



日本的發現

在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正式問世之前，中國人對近代日本的知識幾乎等於零。鴉片戰爭的炮聲震破了中國人的迷夢，有識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尋求「制夷」之道，然而眼光所及，主要是歐美列強，對東瀛鄰國並不在意，這種狀況差不多持續到甲午戰爭。

事情巧得令人不安，黃遵憲積多年之功、嘔心瀝血寫成的《日本國志》由於種種原因遲遲未能面世，直到一八九五年，也就是日本海軍大敗清朝北洋水師、中國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那一年才刻成正式出版，這時距離此書完成已有八年之久。據說那一年清廷外交官員袁昶到南京見張之洞，隨身就帶著《日本國志》，並且這樣對人說：這部書如果早發表的話，可以省去我們對日賠款一萬萬兩銀子呢！梁啟超在《日本國志》後序中也感歎：「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志，梁啟超讀之，欣懌詠歎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憑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從這些話裡，可以體味到一種歷史沉重感，傲慢迂闊的中國統治者一向以「中華」自居，把別國視作「蠻

夷」而不放在眼裡，最後成了不諳世事的井底之蛙，甲午一役，充分暴露了這個致命弱點，其情形，正如黃遵憲指出的那樣：「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已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洲，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議論也者。可不謂狹隘歟！」（《日本國志》自序）

作為時代的先覺者與大清朝廷的開明外交官，黃遵憲最早看到了民族的生存危機與可能的解救之道，他認定：「中國必變從西法，其變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強，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如波蘭之瓜分，則我不敢知。」他衷心希望的，是中國能像日本那樣通過學習西方達到自強，所以才費巨大心力寫這部百科全書式的《日本國志》。既然目的不在日本，而在中國，衡量日本的尺子，主要也是西方——當然是「西學中源」、「中體西用」前提下、形而下的西方，這兩個預設，決定了黃遵憲對日本的解讀帶有強烈的功利性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局限性。《日本國志》以介紹政治制度為主，密切聯繫中國實際，在全書的「凡例」中，作者這樣說明：「檢昨日之歷，以用之今日則妄，執古方以藥今病則謬，故傑俊貴識時，不出戶庭而論天下事則浮，坐雲霧而觀人之國則暗，故兵家貴知彼。日本變法以來，革故鼎新，舊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錄皆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牽涉西法，尤加詳備，期適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統，欲博其事，詳其人，則有日本諸史在。」這種厚今薄古、為我所用的論述方式，體現了作者的真實想法與追求，也暴露了作者知識結構上的局限，黃遵憲不諳日語，無法研讀日本古籍，對日本歷史文化的特殊性自然缺乏了解，只能在「物窮則變，變則通」這樣一個大而化之的真理下，憑藉淵博的中國文化功底、西學的一般常識和能夠掌握的有限日本知識研究日本，對於那些想效法日本、在中國實施變法

的志士來說，無疑有極大的啟發和幫助，然而對於整體地把握日本文化的來龍去脈，揭示日本的廬山真面目，則力有不逮。

儘管如此，作為一位晚清文化巨人，黃遵憲對日本顯示了過人的敏銳，真知灼見散見《日本國志》各卷，至今讀來依然熠熠生輝。比如，「國統志」開宗明義論述世界各國的國體，指出日本是個絕無僅有的存在：「若夫傳世百二十，歷歲二千餘，一姓相承，綿綿延延而弗墜統緒者，其惟日本乎？」在勾勒日本歷史的過程中，黃遵憲對天皇這個「一線相延之統」、「屢蹶而復振」的事實一再表示驚奇，雖然未能上升到對日本的民族理性思考的高度，但這種驚異本身，足以催人對日本與日本文化作出深刻的思考。又比如，在「地理志」裡，黃遵憲指出日本「獨立大海，曠然不與鄰接」的事實，對其閉關自守與積極進取的雙重性予以關注：「余觀亞細亞諸國，印度覆矣，土耳其仆矣，安南、緬甸又傾踏矣。日本自通商以來雖頗受外侮，而家國如故，金甌無缺，猶得以日本帝國之名，捧載書而從萬國後。壤地雖曰褊小，其經營籌畫，卒能自立，亦有足多矣。然而日本論者方且以英之三島為比，其亟亟力圖自強，雖曰自守，亦頗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試展五部洲輿圖而觀之，吾誠恐其鼎舉而躡絕，地小而不足迴旋也。」在日本羽毛未豐的當時，黃遵憲就看出其「以小生巨、遂霸天下」的野心和「鼎舉而躡絕」的後果，可謂目光如炬，後來的歷史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黃遵憲對日本的認識包含了現代世界意識，體現在《日本國志》的寫作上，一改以往中國文人寫史書時那種「華尊夷卑」的姿態，採取尊重對方、互相平等的寫作立場，中國實際上已經從過去「天朝上國」的位置，降低到與日本平起平坐的位置。這種改變，意味著近代以降中日兩國實力的消長與國際地位的歷史性逆轉。然而，這並不意味黃遵憲徹底擺脫了傳統的一大中華思想與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事實毋寧說相反。在《日本國志》裡，作者假設了這樣一個自我循環的邏輯：西學源出中國，日本模仿西方，中

國學習日本。在「學術志」中作者認為：西法立教源於墨子，用法類乎申韓，設官類乎《周禮》，行政類乎《管子》，一切格致之學，散見於周秦諸書，原因是「蓋中土開國最先，數千年前環四海而居者，類皆蠻夷戎狄，鶉居蛾伏，混沌茫昧。而吾中土既聖智輩出，凡所以厚生利用者，固已無不備。其時，儒者能通天、地、人，農夫戍卒能知天文、工執藝事，得與坐而論道者，居六者之一。西人之學，未有能出吾書之範圍者也。」進而主張：「譬之家有秘方，再傳而失於鄰人，久而跡所在，或不憚千金以購還之。」通過考求古制，參取新法，趕超西方列強，再創「內則追三代之隆，外則居萬國之上」的輝煌。這種論述策略，對於一個飽受屈辱、風雨飄搖的「天朝帝國」，無疑是留足了面子，也只有這樣，才能為顛覆自大的清朝統治者接受。

黃遵憲是「同文同種」日本觀的首倡者，在《人境廬詩草》中，他這樣形容中日兩國的關係：「同在亞細亞，自昔鄰封輯。譬如輔車依，譬如倚角立。所恃各富強，乃能相輔弼，同類爭奮興，外侮日潛匿。解甲歌太平，傳之千萬億。」這種日本觀，表達了當時一部分中國知識精英天真美好的願望：既然「同文同種」的日本島國能夠通過變法而自強，「同文同種」而且「泱泱大國」的自家當然更不在話下，只要肯放下架子，向日本學習，把日本變法的經驗學過來，中國的強盛指日可待。然而，甲午戰爭的炮火很快就粉碎了這種一廂情願，日本為了脫亞入歐，加入西方列強的行列，不惜冒險一搏，對曾是自己恩師的中國給以沉重一擊，使腐敗衰朽的大清皇朝陷於萬劫不復之地，證明了「同文同種」的虛幻性。

《日本國志》全書洋溢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它的問世，標誌著中國對日本的態度，由歷來大而化之的怠慢，一變為急功近利的關注。然而日本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它有甚麼與眾不同的特點？這本書還是留下了很多懸念。

附 日本國志（節選）（一八八七） 黃遵憲

日本島國無一事不資之外人〔一〕

余聞之西人，歐洲之興也，正以諸國鼎峙，各不相讓，藝術以相摩而善，武備以相競而強，物產以有無相通，得以盡地利而奪人巧。自法國十字軍起，合縱連橫，鄰交日盛，而國勢日強。比之羅馬一統時，其進步不可以道里計云。其意蓋謂交鄰之有大益也。余因思中國瓜分豆剖，干戈雲擾，莫甚於戰國七雄。而其時德行若孟、荀，刑名若申、韓，縱橫若蘇、張，道德若莊、列，異端若楊、墨，農若李悝，工若公輸，醫若扁鵲，商若計研、范蠡，治水若鄭白、韓國，兵法若司馬、孫、吳，辯說若衍、龍，文詞若屈、宋，人材之盛，均為後來專家之祖。一統貴守成，列國務進取。守成貴自保，進取務自強，此列國之所由盛乎。特其時玉帛少而兵戎多，故未見交鄰之益耳。日本之為國，獨立大海中，於地球萬國均不相鄰，宜其閉門自守，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矣。然而入其國，問其俗，無一事不資之外人者。中古以還，瞻仰中華，出聘之車，冠蓋絡繹，上自天時、地理、官制、兵備，暨乎典章制度、語言文字，至於飲食居處之細，玩好遊戲之微，無一不取法於大唐。近世以來，結交歐美，公使之館，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時、地理、官制、兵備，暨乎

〔一〕 本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典章制度、語言文字，至於飲食居處之細，玩好遊戲之微，無一不取法於泰西。當其趨而東也，舉國之人趨而東；及其趨而西也，舉國之人又趨而西。乃至目營心醉，口講指畫，爭出其所儲金帛以購遠物，而於己國之所有，棄之如遺，不復齒數，可謂驚外也已。由前之弊，論者每病其過於繁縟，失則文弱；由後之弊，論者又病其過於華靡，失則奢蕩。交鄰果有大益乎？抑天下之事，利百者弊十，勢必有相因而至者乎？然以余所聞，日本一島國耳，自通使隋唐，禮儀文物，居然大備，因有禮義君子之名。近世賢豪，志高意廣，競事外交，駸駸乎進開明之域，與諸大爭衡。向使閉關謝絕，至今仍一洪荒草昧未開之國耳。

一姓相承的日本國統

環地球而居者，國以百數十計。有國即有民，有民即有君。而此百數十國，有一人專制稱為君主者；有庶人議政稱為民主者；有上與下分任事權，稱為君民共主者。民主之位，與賢不與子，或數年一易，或十數年一易，無所謂統也；君民共主，或傳賢、或傳子，君不得私有其國，亦無所謂統也。一王崛起，奕葉繩武。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故夫君主之國，有傳之數世者焉，有傳之數十世者焉。如商之歷祀六百，周之卜年八百，其最久者也。若夫傳世百二十，歷歲二千餘，一姓相承，綿綿延延而弗墜統緒者，其惟日本乎？

自神武肇基，洎今皇嗣位，賢主令辟，史不絕書。雖其間女帝乘權，歷世十一，覬覦僭竊，不謂無人。然卒未有挈神器而移之外家，傳之異姓，授之嬖寵者。七豎不驚，宗社如故，可不謂奇歟？將軍擅權，此起彼仆，至有進陪臣而執國命，起奴僕而稱人主者。當時之君，如周之東，僅擁虛位，乃至設監置戍，供億匱乏，求為編戶細民而不可得。然歷年七百，卒無人焉犯不韙而干大命者。太阿下移，玉步未改，斯又奇矣。霸政久竊，

民心積厭，外侮紛乘，內訌交作。於是三豪傑，乘時而起，覆幕府而尊王室，舉諸侯封建之權，拱手而歸之上，卒以成王政復古之功，國家維新之治。蒙泉剝果，勃然復興，又一奇也。且夫物極必反，事窮必變。以一線相延之統，屢蹶而復振，宜乎劍璽之傳與天壤無窮矣。然而近日民心漸染西法，竟有倡民權自由之說者。中興之初，曾有萬機決於公論之詔，而百姓執此說以要君，遂聯名上書，環闕陳訴，請開國會而伸民權。而國家僅以遲遲有待約之，終不能深閉固絕而不許。前此已開府縣會矣，竊計十年之間，必又開國會也。嗟夫，以二千五百餘歲君主之國，自今以往，或變而為共主，或竟變為民主，時會所迫，莫知其然。雖有智者，非敢議矣。

遠隔強國的東方樂土

於茫茫大地之中書疆分土而名之為國，其壤地莫不相接，其疆場莫不相奪，其強弱大小無定形，則有曰辟國而曰蹙國者，上下千古，橫覽九州，莫不然矣。而日本之為國乃獨立大海中，曠然邈然不與鄰接，由東而往凡歷一萬五千餘里，乃至美利堅。由西南而往凡歷二千里，乃至上海、台灣。即最與鄰近之朝鮮，亦歷數百里而後能至。自神武紀元以來二千五百有餘歲，未嘗舉尺寸之土與人，亦未嘗得尺寸之土於人，雖近日開拓蝦夷，交換樺太，吞滅琉球，似有異於前之版圖者，然蝦夷本羈縻之州，樺太非固有之地，琉球乃甌脫之土，得非果得，失亦非失。蓋自有日本以後即守此終古一成而不變，不亦奇乎。余聞歐西有瑞士，山水清華，士女明媚，以介居諸大間，各謀保護，不相侵擾，世人比之桃源。而東方之日本，乃以遠隔強國自成樂土，天殆故設此二國使之東西並峙歟。自德川氏以禁教故丸泥封關，謝絕外客，子孫世守其法，膠柱拘泥二百餘載，無所見於外者無所羨於內，無所聞於內者亦無所懼於外。當是時也，上以武斷為政，下以卑屈為俗，熙熙攘攘，

娛樂無事。而歐洲諸國鷹睥鸚視，強弱相併，閱一爭戰則國步日進。北則有彼得加他鄰，明毅果斷，氣吞南溟；西則有若拿破崙，雄才偉略，諸侯稽首；又西則有若華盛頓，艱苦卓絕，獨立一洲。或英人吞併五印度，撫有而國；或俄人建萬里鐵道，以通浩罕；輪船、電線，爭鶩紛起，機巧奪天工，人智欺鬼神，凡西人兵威宗教，幾幾乎彌綸地球而無所不至。而日本閉門自守，無見無聞，矇然末之知也。直至堅船巨炮環伺於門，乃始如夢之方覺，醉之甫醒。雖曰鎖港逐客，國體如此，亦未始非地勢使之然也。嗟夫！事變之極，開闢未聞。以日本四面瀕海，古稱天險，二千餘載，絕無外患。而自輪船鐵路縱橫於世，極五大洲之地若不過彈丸黑子之大，各國恃其船炮又可以無所不達。昔林子平有言，日本橋頭之水直與英之倫敦、法之巴里相接。古所恃以為藩籬者，今則出入若庭戶矣。言念及此，地險足恃乎？余觀亞細亞諸國，印度覆矣，土耳其仆矣，安南、緬甸又傾蹙矣。日本自通商以來雖頗受外侮，而家國如故，金甌無缺，猶得以日本帝國之名，捧載書而從萬國後。壤地雖曰褊小，其經營籌畫，卒能自立，亦有足多矣。然而日本論者方且以英之三島為比，其亟亟力圖自強，雖曰自守，亦頗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試展五部洲輿圖而觀之，吾誠恐其鼎舉而贖絕，地小而不足迴旋也。

西法中源，不憚千金以購還之

以余討論西法，其立教源於墨子，吾既詳言之矣。而其用法類乎申韓，其設官類乎《周禮》，其行政類乎《管子》者，十蓋七八。若夫一切格致之學，散見於周秦諸書者尤多。蓋中土開國最先，數千年前環四海而居者，類皆蠻夷戎狄，鶉居蠹伏，混沌茫昧。而吾中土既聖智輩出，凡所以厚生利用者，固已無不備。其時，儒者能通天、地、人，農夫戍卒能知天文、工執藝事，得與坐而論道者，居六職之一。西人之學，

未有能出吾書之範圍者也。西人每謂中土泥古不變，吾獨以為變古太驟。三代以還，一壞於秦之焚書，再壞於魏晉之清談，三壞於宋明之性命，至詆工藝之末為卑無足道，而古人之實學益荒矣。大清龍興，聖祖崛起，以大公無外之心，用南懷仁、湯若望為台官，使定時憲。經生之兼治數學者，類多融貫中西，闡竭幽隱，其精微之見於吾書者皆無不樂用其長。特憾其時西人藝術猶未美備，不獲博採而廣用之耳。

百年以來，西國日益強，學日益盛，若輪船，若電線，日出奇無窮。譬之家有秘方，再傳而失於鄰人，久而跡所在，或不憚千金以購還之。今輪船往來，目擊其精能如此，切實如此，正當考求古制，參取新法，藉其推闡之妙，以收古人製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夫所由來，惡其異類而並棄之，反以通其藝為辱，效其法為恥，何其隘也！夫弓矢不可敵大炮，槳櫓不可敵輪船，惡西法者亦當知之。特未知今日時勢之不同，古人用夏變夷之說深入於中，誠恐一學西法，有如日本之改正朔，易服色，殊器械以從之者，故總總然過慮。欲並其善者而亦棄之，固亦未始非愛國之心。顧以我先王之道德，涵濡於人者至久；本朝之恩澤，維繫於人者至深。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終不至盡棄所學而學他人。彼西人以器用之巧，藝術之精，資以務財、訓農，資以通商、惠工，資以練兵，遂得縱橫倔強於四海之中。天下勢所不敵者，往往理反為之屈，我不能與之爭雄，彼挾其所長，日以欺侮我，凌逼我，終不能有簪筆雍容坐而論道之日，則思所以捍衛吾道者，正不得不藉資於彼法以為之輔，以中土之才智，遲之數年即當遠駕其上，內則追三代之隆，外則居萬國之上，吾一為之而收效無窮矣。曾是一慚之不忍，而低首下心、沁沁睨視，為民吏羞乎？且器用之物，原不必自為而後用之，泰西諸國以互相師法而臻於日盛，固無論矣，日本叢爾國耳，年來發憤自強，觀其學校分門別類，亦駸駸乎有富強之勢。則即謂格致之學，非我所固有，尚當降心以相從，況古人之說，明明具在，不恥術之失其傳，他人之能發明吾術者反惡而拒之，指為他人之學，以效之法之為可恥，既不達事變之甚，抑亦數典而忘古人之實學，本朝之掌故也已。